

#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 临安研究（续）上

辛 薇 主编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 临安研究（续）上

辛 薇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 (续上下) / 辛薇主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1-011234-3/

I. ①南… II. ①辛…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南宋

②临安市-地方史-研究-南宋

IV. ①K245.07 ②K29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7519 号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续上下)**

NANSONGSHI JI NANSONG DUCHENG LINAN YANJIU (XU)

---

主 编: 辛 薇

责任编辑: 张秀平

装帧设计: 徐 晖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www.peoplepress.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厂: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71.25

字 数: 1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11234-3/

定 价: 195.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 序

辛 薇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成立已有7年,被列为浙江省首批11个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也有6个年头了。自中心成立以来,在省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通过全院上下的共同努力和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直接参与,南宋史研究中心较为出色地完成了设立之初制定的搭建平台、推进学术、促进交流、推出精品、培育人才,为建设浙江文化大省及杭州文化强市作出贡献的预定目标。南宋史研究中心在几年时间内出版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通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既推动了南宋史研究的广泛交流和深入发展,也扩大了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在学术界的影响,获得了国内外同行们的好评。

继2008年首届“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之后,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又于2011年10月22—23日,承办了“第二届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等海内外近90位对南宋历史文化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来到杭州共襄盛会。这些专家学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专家,又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向研讨会提交的高水平论文,涉及了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各个层面。有的专家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南宋的历史地位以及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和南宋的灿烂文化;也有专家从微观的角度研究了南宋各个领域,如对南宋时期的西湖



## 2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续）

游船的大小进行了研究,对南宋人物进行了个案研究。这些论文涵盖面广,不仅代表了学者本人近期的研究成果,也反映了当前南宋史研究的前沿水准,是对近年来海内外南宋史研究的一次大检阅。

本次研讨会硕果累累,成效显著,获得了各方面的一致肯定。与会专家对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搭建平台,推进学术”的创新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正如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先生在闭幕式上代表与会专家发言时指出的那样,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开展的南宋史研究工作向“我们全国的学术界发出了一个确定无疑的口号:重新评价南宋”。南宋史研究中心自草创至今,“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南宋史研究中心本来是杭州市的科研机构,现在确确实实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引领、组织、推动全国南宋史研究发展的平台……是我们国家学术研究体制的创新”。不少学者表示,希望几年之后能够再次聚首杭州,参加下一届“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杭州在历史上是南宋的都城,有着上千年的文化底蕴。本次研讨会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于将杭州建设成为文化强市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在学术会议结束后,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将会议论文集集出版,以期推动南宋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是为序。

辛 薇

2012年12月于杭州市社会科学院  
(作者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 目 录

##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续上)

序 .....	辛 薇(1)
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 .....	曹家齐(1)
宋代讲武礼的主要内容及其演变 .....	陈 峰(23)
宋代军政腐败的缩影:将帅“贪而猎士卒” .....	王云裳(37)
论南宋时期地震的时空分布及其特点 .....	张全明(50)
南宋富民阶层成长的社会空间分析 .....	张锦鹏(70)
试论南宋的社会教育 .....	苗春德(86)
南宋社会中的契丹人 .....	王善军(101)
后妃与南宋政治	
——以家、国关系为线索 .....	曾庆瑛 陈智超(121)
透过帝王传记看南宋“重文”文教政策的传承与调适 .....	赵国权(131)
南宋中央监察制度变迁略论 .....	贾玉英(145)
南宋的行团会社 .....	方 健(163)
南宋赋役制度整顿及其经验教训 .....	葛金芳(181)
南宋朝贡体系的构成与运行 .....	黄纯艳(206)
南宋历史文化资源的当代产业化运用和路径探讨 .....	陈 野(222)
南宋出版文化特色考述 .....	章宏伟(233)

## 2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续上)

- 南宋民众诉讼成本问题探析…………… 郭东旭(273)
- 宋代离婚探考
- 重点以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载案件为例…………… 方建新(288)
- 南宋临安与纸币…………… 高桥弘臣 梁琼之译(319)
- 走出宫院:南宋宫学向宗学的转变…………… 何兆泉(334)
- 南宋皇城东宫初探…………… 林正秋(345)
- 南宋临安十大御前宫观考略…………… 鲍志成(358)
- 南宋绍兴二十五年的占城朝贡…………… 土肥祐子(379)
- 南宋早期宫廷用瓷及相关问题探析
- 从原杭州东南化工厂出土瓷器谈起…………… 邓禾颖(402)
- 日僧俊芿与南宋文人士大夫的交往…………… 定源(409)
- 东京梦华:南宋人的开封记忆…………… 梁建国(426)
- 南宋西湖上的游船有多大?
- 论宋代量度船只大小的单位与方法…………… 李弘祺(444)
- 从造纸遗址的发现看南宋临安的竹纸生产技术…………… 唐俊杰(462)
- 北宋中原风俗对南宋浙江的影响…………… 徐吉军(473)
- 宋高宗时期的策试与应试者对社会的认识…………… 裴淑姬(497)
- 南宋初期降伪游寇略论…………… 虞云国 倪洪(509)
- “层累地造成”的宋金采石之战史发覆…………… 顾宏义(521)
- 虞允文事迹编年考…………… 祖慧 张香宁(551)

## 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

曹家齐(中山大学)

两宋先后与辽、西夏、吐蕃、大理、交趾、金、(蒙)元诸政权长期并立,在外交、边防与民族关系诸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其中,位居北方的辽、西夏、金、(蒙)元先后对两宋构成严重威胁,而后两者又直接导致北宋与南宋之覆灭。因此,宋朝与这几个政权之关系,构成这一时期军事与民族关系之主线,并成为牵动整个政治格局跌宕嬗变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在南方,随着大理和交趾的强盛及与中原王朝之疏远,宋朝南部边疆形势亦与以往大有不同。宋朝一方面要重点防御来自北面的威胁与压力,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保持南面,特别是岭南地区之安宁。因此,对岭南地区之经略,亦是两宋忧心之问题。

保持并加强朝廷与边地之信息沟通,无疑是一个政权经略缘边地区的必备前提,而文书传递则是古代信息沟通的主要手段。以往关于宋代文书传递研究之成果,或侧重于制度建设层面,或较多关注传递渠道问题,至于朝廷与缘边等地之间文书传递所经行之路线、文书传递之具体方式和手段,以及在既有制度保障下之传递效果,则罕有专门之探讨。<sup>①</sup>而这些问题,在考察宋朝的缘边经略方面,又无疑居于十分重要之位置。本文拟对两宋朝廷与岭南地区之间文书传递诸问题进行考察,作为探讨宋朝对岭南经略之一方面。



## 一、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文书传递路线

宋代岭南地兼广南东、西路,既有第一对外贸易港广州,是海外舶货之重要供应地,又边邻交趾、大理等国,属于重要边防区域。因此,无论与中央之间的交通运输,还是信息沟通,都很重要。如北宋后期,广南东路有邮路5100里,广南西路更有12600余里,两路之邮路总和与河北东、西和河东三路邮路里数相差无几。<sup>②</sup>北宋京城与岭南之间不仅设有专门运送物资的递铺,如香药递,亦设有传递文书之递铺。<sup>③</sup>但具体设在那些路线则无详备之记载。

北宋时期,京城通往岭南的道路主要有三条:一条自开封西南行,经许州(元丰三年改称颍昌府,治长社,今河南许昌市)至襄州(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自襄州分别经江陵府(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和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至潭州(治长沙、善化,今湖南长沙市)、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市),然后分别至广西和广东;一条从开封至许州,再经蔡州(治汝阳,今河南汝南市)、颍州(治汝阴,今安徽阜阳市)、庐州(治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县),渡江至江州(治德化,今江西九江市),再自江州南经洪州、吉州、赣州,越大庾岭至广东;一条从开封循汴河东南行,经应天府(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南)、宿州(治符离,今安徽宿州市)、泗州(治盱眙,今江苏盱眙北),然后南行经扬州天长县(治今安徽天长县)南渡长江至润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市),再自润州沿江南运河岸经苏州(治吴县、长洲,今江苏苏州市)、秀州(治嘉兴,今浙江嘉兴市)至杭州(治钱塘、仁和,今浙江杭州市),再经睦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市东北)、婺州(治金华,今浙江金华市)、衢州(治西安,今浙江衢州市)、信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西北)至江西、福建和岭南道。<sup>④</sup>

以上三条道路是北宋京城连通岭南的交通干线,官府陆路纲运、官员和商旅往来,皆以这几条道路为主。一般来说,递铺之设亦应以这几条道路为

主。先看香药递：

宋初，为将广南香药运至京师，自京至广州设置香药递铺，但到咸平五年（1002）七月，则“诏户部判官凌策与江南转运使同计度，罢省自京至广南香药递铺军士及使臣计六千一百余人，皆陆运至虔州，然后水运入京。”<sup>⑥</sup>之所以如此，即是“以广南市（泊）[船]陆运艰费，议自南安军（治大庾，今江西大余县，辖境在今赣州市西部）路泛舟抵京师。”<sup>⑦</sup>即由原来陆运改为陆水结合，自南安军路泛舟至京师，也就是从广州陆行越大庾岭经南安军至虔州，再改水路，顺赣水至长江，再经运河至京师。那么，原来陆运香药道路经何处呢？咸平五年，仅为诏罢自京至广州香药递铺军士及使臣，并未罢去递铺。天禧元年（1017）七月，知许州向敏中曾言：“况自襄至许香药递铺，别无大段纲运，其计度收杂斛斗价钱，欲乞权且入香药递铺递至许州下卸。”<sup>⑧</sup>由此知原来自京至广州陆运香药路线，当是自开封经许州至襄、荆，再经潭州至广州道。

实际上，北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亦是走的经江陵府、潭州至岭南，和经江州、大庾岭至岭南的两条道路。这从下列记载可以看出：

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二十二日，兵部状：“点检编排自京至荆湖南北路马递急脚铺所状，今点检得鼎州敖山铺至辰州门铺人马，除传送文字外，其余人马多缘应付军兴差出，勾当官员、诸色人打过。”<sup>⑨</sup>

政和三年（1113）二月二十九日，尚书省札子：勘会急脚及马递铺，昨措置私拆、盗毁、亡失、留滞约束，法令备具。近来所属官司并不检举觉察。近奉圣旨措置，今欲依下项：契勘昨为巡辖所管地分，内有千里以上地分广阔去处，例皆检察不遍。且如江西路虔州等处，使臣一员，见管地分三千八百余里，显是不能依限巡遍，致铺兵作过。今欲每及千里差置一员，旧额多寡处自依旧。仍仰逐处路提举官，将所添使臣以州军远近、道路顺便接连去处，重别均定，具合以某处窠名申吏部差注。所有不曾添置去处，如见管地里轻重未均，亦仰重行均定。其使臣廩宇，仍于所管地分中路安置。……江西路七千三百里，管巡辖使臣三员，欲添置四员。湖（北）[南]路除潭、衡、邵州（军）、武冈军各置巡辖

#### 4 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续上)

使臣一员外,永、全、道、(彬)[郴]州、桂阳监三千八十五里,共管巡辖使臣二员,欲添置一员。……广东路五千一百余里,管巡辖使臣七员,欲更不添置。广西海北二十三州,计一万二千六百余里,管巡辖使臣六员,欲添置六员。广西海南琼州、昌化军、万安军、朱崖军共四州军,自来只是巡检兼管巡铺,未曾专置巡铺使臣,欲专置巡辖使臣一员……<sup>⑨</sup>

从以上两段记载看,荆湖南北路之荆、潭、衡一线皆设有递铺,此一路线又可经郴州、全州分别至广东和广西。而江西一路一直至虔州之邮路亦应是联通京城与广东的文书传递路线之一。无论经郴州至广东,还是经虔州至广东之邮路,都应是经韶州(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市),如《太平寰宇记》记英州(治浚阳,今广东英德市)“四至八到”云:

新置州《图经》上未有至两京里数。东至浚州河源县分水岭三百里。西至连州阳山县界一百七十里。南至。(缺。)北至韶州银冈驿八十五里。东北至韶州翁源县一百四十五里。东南八十里大驿路,下至广州,上至韶州,其路有风门岭,险不通鞍马。<sup>⑩</sup>

按“驿路”为邮传剧道,<sup>⑪</sup>《太平寰宇记》记英州至广州有大驿路,而又向北连通韶州,则此驿路为连接江西、湖南来路的文书传递路线无疑。

沿运河经镇江、杭州,再经大庾岭至岭南之路线,虽亦可通岭南,但由于路途迂远,故北宋时应不作为中央与岭南之间的主要文书传递路线。这条路线充当中央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路线应是南宋时期之事。

南宋定行都于临安后,政治重心南移,临安也从而成为交通重心。从临安西南行经大庾岭至广东之路线显然成为南宋行都连通岭南之最便捷路线。《咸淳临安志》曾记载临安南路钱塘、富阳、新城县界之斥候铺,正在临安联通江西、岭南的路线之上,<sup>⑫</sup>可看作此线作为朝廷与岭南之间文书传递路线的证据之一。此路线为当时之驿路,自新城以远的大致走向是经严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梅城镇)之桐庐、建德、寿昌至衢州(治西安,今浙江衢州市)、信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市西北),然后达江西、岭南、福建等地。<sup>⑬</sup>但此驿路自信州经何地而达赣州,再至广东呢?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三月,周必大自临安归庐陵,五月,经衢州、信州及信州之弋阳、贵溪等县,然后从贵溪陆行向西南,经金溪(抚州辖县,在今江西金溪)而至建昌军(治南城,今江西南城县),向南再经南丰(今江西南丰),于月底抵建昌军广昌县(今江西广昌),六月初一日,从广昌继续前行,经赣州辖县宁都(今江西宁都)、雩都(今江西于都)而达赣州,然后乘船入赣水北上至吉州(治庐陵,今江西吉安市)。其日记云:

六月朔庚申,早发广昌,以驿路无人烟,出西门入小路,多行崖腹及野,约二十里至郎君潭,始遇村店。四十里达驿路,遂入宁都界。<sup>④</sup>

按广昌、宁都之间若有驿路,其向北则应通往信州之贵溪县,向南则达赣州,进而越大庾岭而达广东。此线应是临安府向西南连通广东最便捷之邮传路线,应与北宋时取赣水一线有所不同。

尽管大庾岭路仍是南宋前往广东的主要途径,但是,假如临安与广东东部州县之间往来再走此路,就显得迂远不便。于是,临安与广东东部之文书传递便渐渐改走福建路。如嘉定六年(1213)五月,监登闻鼓院张镐上言文书传递之事曰:

一路有一路之递铺,事有所属,自可谁何?惟其有路,两相邻之州各不相关,递角之沉匿,无从稽考。昨守潮州,目击此弊。潮州属广东,若取本路递角,则自江西之广州,而后达潮,其路为迂,故多由福建路转达,取其便速也。惟是福建路递铺官兵与潮州不相统属,故每每有沉匿之患。乞朝廷详酌,以福建路漳、泉州巡辖递铺官到任满罢,并令从潮州保明批书;广东路潮、梅州巡辖递铺官到任满罢,即从漳州保明批书。异时赴部注拟,得以点对递角有无通滞,以为升点。庶几两路互有统摄,可革此弊。<sup>⑤</sup>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南宋朝廷与广东之间的文书传递,确曾利用江西至广州之路线,但与广东东部文书传递之往来,当是经福州、泉州、漳州至潮州与梅州之陆路。这条道路之两浙至福建段有两种走法,一是从临安西南行至衢州或信州,再经建州(绍兴三十二年改建宁府,治建安,今福建建瓯

市)而东南行至福州;二是从临安南行,经温州至福州之路线。前者至迟在唐代便已畅通,后者则应是北宋中期开通。<sup>⑥</sup>但考南宋时福州以北及台州等地驿传设置状况,临安府与福建及广东东部地区的文书传递,当不常经温州至福州道路,而应是主要依靠衢州或信州经建州至福州之驿路。<sup>⑦</sup>

如果说北宋时京师东京开封府与两广距离相差无多,那么南宋时京城临安府与两广的距离却相差甚多了。南宋时广西与临安府之距离要比广东离临安府远得多,中央与广西之间的文书传递路线又作何选择呢?

南宋晚期,蒙古采取“斡腹之谋”,犯大理,攻交趾,谋从右翼突破宋西南防线,向长江腹心之地推进,结合四川、湖北战场,对宋形成三面夹击的态势。于是,久无边患的广西地区,陷入紧张局势之中。为了加强广西之守御,宝祐五年(1257)十一月,宋廷任命李曾伯以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节制广南,旋改任为广南制置大使兼知静江府(治临桂,今广西桂林市)。李曾伯于次年二月抵达静江府,任职于广西,一直到景定元年(1260)七月止。其间,李曾伯多次向理宗奏报广西情况,透露出南宋时中央与广西之间文书传递所经行的大致路线。如宝祐六年夏李曾伯所上两封《回奏宣谕》云:

臣六月十六日卯时,收六月初一日酉时递,准当日巳时阁长邓克中传奉圣旨,……所准圣旨,邮递迟缓,此则今所遣递与前入规模则同,自桂至潭皆四日半,但自潭以往,不系本司递兵,所难号召。今遵圣旨,更于自桂至潭添置六铺,自当常切督趣,更乞朝廷札下江、潭两阃,并行戒谕,庶无稽滞。伏乞睿照。

臣六月二十八日遣递具奏甫毕,随领当月十三日递承苑使刘遵六月十二日午时恭奉圣旨宣谕。……臣又准圣旨,以发递迟缓,臣近已添置邮铺,且闻湖南帅阃亦更置铺分一新,之后必须稍速。臣继当一月驱磨一次,时刻违甚者,重寘施行矣。伏乞睿照。<sup>⑧</sup>

李曾伯两封奏札均明确显示出当时广西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传递,是从静江府东北行至湖南,经潭州而达临安。当时军情紧急,这条路线应是最为快捷之路线。无论何时何地之文书传递,皆求迅捷快速,估计南宋朝廷与广西之文书传递,平时亦应依靠潭州、静江府之路线来沟通。这条路线之潭州

至广西以远,大概是经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市)、永州(治零陵,今湖南永州市)、全州(治清湘,今广西全州市)至静江府,再达邕州及广地各地。潭州至临安府之路线,应是向东经袁州(治宜春,今江西宜春市)而至。此线不仅是临安连通广西的便捷邮传之路,亦应是人员往来的常行通道。如绍兴元年,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言其曾自桂岭至临安,先后入衡州、潭州界,再自潭州界入袁州界。<sup>①</sup>袁州向东,经临江军(治清江,今江西樟树市西南临江镇)、抚州(治临川,今江西临川市)、信州、衢州而至临安。其中潭州至信州之道路,乃是在宋代才陆续开通,至迟在南宋时已有驿传设置。此路开通后,信州始成为连接福建、荆湖、广南、江西等地的通要之地。<sup>②</sup>

潭州、静江府一线应是正常情况下南宋朝廷与广西的文书传递路线。非常情况下,亦有别的走法。如开庆元年(1259)八月,蒙古兵第二次进攻广西,抵静江府城下,不久又进入湖南,导致静江府通往临安的邮传道路阻塞。在这种情况下,李曾伯在尝试让递兵从小路到全州之外,则改派递兵“取路广东,度梅岭,出江浙,前诣行在投下[奏札]”。<sup>③</sup>

## 二、两宋京城与岭南之间递铺设置状况

从文献记载看,北宋自灭掉南汉后不久就设置了朝廷与岭南之间的邮传系统。如太平兴国八年(983)二月六日,诏“自京至广州传置卒月别给百钱”,<sup>④</sup>由此推知开封至广州间的递铺设置应在这之前。这条道路上不仅设置了递铺,而且铺内亦应有马匹。如真宗咸平三年(1000)八月十四日诏书有云:“访闻差往四川、广南等处知州、通判、都监、监押,及勾当事朝臣,有例乘递马者,多请走马头子,乘骑递马即慢乘进发。”<sup>⑤</sup>此条并未明言广东、广西,所言“广南”当包括东西两路。按,宋代馆驿中已没有马匹供应,官员差出所乘递马即递铺中之马,而递铺既可供官员差出乘骑,亦用于文书传递。<sup>⑥</sup>既如此,则京城至岭南之间至迟在真宗初年便已有马递之设。尽管如此,由于岭南长期无大事端,故马递之设置甚为薄弱。

景德四年(1007)六月,宜州军校陈进鼓噪士卒杀知州刘永规及监押国均,拥判官卢成均为帅,号南平王,据城反叛。七月,朝廷接到奏报,一方面遣兵讨捕,派官招抚,另一方面,则“增置自京至宜州马递铺。”<sup>⑤</sup>由此可见,北宋京城与广西之间的马递设置是随形势的不同逐步发展和完善的。

仁宗宝元、庆历时,宜州又有蛮人生变,朝廷与广西之间的文书传递又变得至为重要,但采取什么措施尚未明了。《长编》载:庆历五年(1045),“[广西转运使杜]杞初行至真州,先遣急递以檄谕蛮贼,听其自新。比至宜州,蛮无至者。”<sup>⑥</sup>从此言看,似乎庆历年间广西已有急脚递之设,而据沈括所言急脚递“唯军兴则用之”<sup>⑦</sup>的设置原则而言,亦不无可能。但若参照以后广西递铺之设置情况,此处之“急递”可能是指“马递”。

皇祐年间,侬智高为乱,宋廷为保障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于皇祐元年(1049)十月壬午“诏马铺以昼夜行四百里,急脚递五百里”。<sup>⑧</sup>四年七月下诏,“自京至广州增置马递铺,仍令内臣一员提举。”<sup>⑨</sup>九月,又“赐自京至广南西路马递铺卒缗钱”,<sup>⑩</sup>以激励铺卒传递文书的积极性。可以看出,即使是最令北宋朝廷紧张而忧心的侬智高之乱期间,无论是京师至广州,还是至广西,都还只是设置马递,而未见有急脚递之设。

北宋在京城与岭南之间设置急脚递是在神宗时期。神宗即位,任王安石而兴变法,并务开边以广疆土。在推行新法之同时,亦对西北之熙河、西夏及南方之交趾用兵。熙宁六年(1073),用沈起知桂州,沈到任后,“妄意朝廷有攻取谋,欲以钓奇立异为功,始遣官入溪峒,点集土丁为保伍,授以阵图,使岁时肄习,继命指使因督饘盐之海滨,集舟师寓教水战,故时交人与州县贸易,一切禁止之。”继任者刘彝则“日遏绝其(交趾)表疏”。<sup>⑪</sup>结果交趾先发制人,于熙宁八年冬分三路侵入宋境,“连陷钦、廉二州。廉土丁八(十)[千]守城,皆驱令负担登舟,已而尽杀之。又陷邕州,杀(李)[守]将苏緘,屠其民五万余口。”<sup>⑫</sup>继而又陷钦州等地。交趾迅猛之攻势和残酷之杀戮使宋朝野震惊。宋廷相继派重兵入广西与交趾境内,攻取广源州等地,进抵富良江。虽然颇有斩获,最终却使“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sup>⑬</sup>



无法进兵,又兼交趾愿意遣使奉表,只好班师。总的说来,宋军之反击及神宗、王安石谋取交趾之计划,以失败而告终。<sup>④</sup>

此次对交趾用兵,乃是北宋继皇祐平定侬智高变乱后又一次对南疆之军事行动,其用兵规模超过皇祐,而且这次行动又深系开边扩土之全局,故对朝廷之压力亦应胜于皇祐之时。为了及时掌握前线事态,便于决策、指挥,保证朝廷与岭南文书传递之快捷是首要条件。神宗熙宁八年(1075)十二月二十一日,“诏自京至广西邕、桂州已来沿边,置急递铺,仍令人内省差使臣一人点检。”<sup>⑤</sup>此诏下于神宗闻钦州失陷之日,亦是派遣大军南征之前。此应是京师与岭南之间设置急脚递之始。之后,京师与岭南之文书传递线上,便是马递与急脚递铺并存了。如元丰元年(1078)五月,神宗手诏:

日者,广西凡有边事,动至五六处交奏,不惟过于张皇,深虑缘路习为常事,或真有边机当速者,反致稽迟。可速下转运、提点刑狱、经略邕州安抚都监司,自今后非紧切边事,毋得擅发急递。<sup>⑥</sup>

又如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兵部状,言及“自京至荆湖南北路马递急脚铺”。<sup>⑦</sup>不仅如此,利用急脚递传送的金牌之创设,亦始于神宗时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如熙宁十年正月壬子,神宗御批:

安南行营军前动静,朝廷欲日知之,可令权发遣邕州事周沃日具以闻,递角后,别用长牌,大书‘枢密院急速文字,毋得入铺’。<sup>⑧</sup>

此处所言传递枢密院急速文字所用之长牌,即金牌之雏形,元丰六年(1083)形成定制。<sup>⑨</sup>

两宋之际,因政治腐败与金兵南侵,许多地区的邮传系统遭到破坏。此时,岭南因居后方,且无大事,邮传所受破坏应相对小些。为预防金军之南侵,保证新政权与辖内各地的紧急文书往来,南宋朝廷曾屡次下诏整顿邮传,但都收效甚微。最后南宋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新建一套应急性文书传递系统。最先设置的是斥堠铺。建炎三年二月十八日,知杭州康允之开始在本路交通要道设置斥堠铺,“每十里置一铺,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每铺五人,新旧弓手内选有心力、无疾病、能行步少壮人充,每日添支食钱三

百文省。”<sup>④</sup>斥堠本是设于边疆和战争前沿地区侦察和传送情报之机构,而今南宋则将其发展为一种专门的递铺,设于行在通往前线之要道,不仅专设于两浙路,淮南、荆湖、江南东西路和四川等地亦有设置。<sup>⑤</sup>南宋初设斥堠铺地区,应不涉及岭南。绍兴二年(1132),宋廷派遣岳飞等率军围剿盘踞在湖南的流寇曹成、马友,结果曹成闻岳飞进兵消息,则“分路逃遁,前去全、永、贺州界去乞,至三月二十七日并已起离道州尽绝”。<sup>⑥</sup>后又侵犯封、连、昭、桂等州,<sup>⑦</sup>对广南州县造成骚扰,后岳飞军长途奔袭,才将其剿灭。<sup>⑧</sup>此时南宋有无整顿或增设至广西之递铺,未见记载。

因斥堠铺传递效果并不理想,绍兴四年,为应对严峻之战争局势,宋廷又“令淮南、荆湖、江南、两浙通接沿边,探报军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经由州军去处,并取得路接连措置摆铺至临安府。”<sup>⑨</sup>即又在斥堠铺之外设置摆铺。<sup>⑩</sup>摆铺初设时每二十里置一铺,<sup>⑪</sup>绍兴末年,又以“每十里置铺”。<sup>⑫</sup>摆铺与斥堠铺主要区别有二:一是军兴时临时设置;二是先后隶枢密院、三衙和诸军管辖,带有较强的军事化性质。南宋设置摆铺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绍兴四年到绍兴十三年,这一阶段所置摆铺大概是由枢密院、各路帅臣及地方长官负责的。绍兴十三年,宋金议和已经两年,两国久无战事,摆铺已无用途,徒为州县之负担,在御史中丞罗汝楫建议下废罢。第二个时期是从绍兴末年到宁宗嘉定(1208—1224)时。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南下侵宋,两国之间又起战火。于是,南宋再置摆铺传递军事情报。从此数十年间,宋金冲突不断,几战几和,摆铺亦是屡罢屡设。但这一阶段设置之摆铺,却不再由枢密院和诸路帅臣等负责,而是改归三衙和诸军负责。<sup>⑬</sup>

综观南宋两个时期的摆铺设置,亦未涉及岭南。那么南宋前期行都至岭南之间的递铺设置又如何呢?隆兴二年九月,大臣在上言中曾提到“提举广南西路马递铺”。<sup>⑭</sup>由此推知南宋前期行都与岭南之间的递铺设置仍为省铺(即由尚书省统辖之旧有递铺),其中马递当是常设并用来传递紧急文字的递铺。

但到了理宗朝蒙古军威胁广西时,京城与岭南之间的递铺设置就发生